

# 清华简《五纪》中的黄帝故事<sup>\*</sup>

程 浩 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副教授)

DOI:10.13619/j.cnki.cn11-1532/k.2021.09.008

黄帝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位上古帝王,被后世尊奉为“人文初祖”。战国秦汉时期,有关黄帝故事流传甚广。先秦史书《左传》《国语》,以及《管子》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等诸子对其事迹均有描述。到了汉初,由于统治者对“黄老”之学的重视,以黄帝为背景题材的文献更是盛行一时,并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诸子略、兵书略、数术略、方技略均著录有“黄帝书”,根据学者统计,竟有 31 家、589 篇(卷)之多<sup>[1]</sup>。

早期文献中黄帝故事的丰富多元,在出土材料中也有体现。银雀山汉简《黄帝伐赤帝》《地典》,以及马王堆帛书《十六经》《十问》等,皆是以黄帝为背景的文献。清华简《五纪》现存 120 余支简,该篇部分内容涉及战国时期对黄帝传说的记述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《五纪》采用春秋战国文献常用的“天见妖祥—圣贤救世”的叙事模式<sup>[2]</sup>,谓后帝通过“修

历五纪”等举措平息了天下祸乱。在简文的具体阐释中,“五纪”分别可与五时、五色、星宿、神明、干支等抽象概念,以及量具、五官、脏器、骨骼、尺度等具体事物相联系,是时人的宇宙生成论、五行数术学说、天文历法、自然科学知识的集中展示。为了论证作为“天神”的后帝所设计的“五纪”体系切实有效,简文以最初的“人王”黄帝为例,集中描述了人世间对这套理论体系的具体实践。

这一部分的简文,从黄帝建邦立国说起:

黄帝之身,尊(溥)(简 97)又(有)天下,始又(有)桓(树)邦,始又(有)王公。四荒(荒)、四穴、四桓(柱)、四唯、群示(祗)万兑(貌)焉始相之。(简 98)

简文云黄帝树邦,四荒、四穴、四柱、四唯等天神降地作为他的辅佐,犹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舜有“四岳”<sup>[3]</sup>。文献中有“黄帝四面”的说法,见于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九引《尸子》之文:“子贡曰:古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20&ZD309)和“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19ZDA250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者黄帝四面,信乎?孔子曰:黄帝取合己者四人,使治四方,不计而耦,不约而成,此之谓四面。”<sup>[4]</sup>在孔子看来,所谓“黄帝四面”,即在四方都有佐治之臣。这种认识可以得到清华简《治政之道》的印证,简文载“夫昔之曰:‘昔黄帝方四面’,夫岂面是谓,四佐是谓”<sup>[5]</sup>。值得注意的是,马王堆帛书《十六经·立命》载:“昔者黄帝,质始好信,作自为象,方四面,傅一心,四达自中,前参后参,左参右参。”<sup>[6]</sup>李零认为这是“把黄帝摆在一个四方十二位的方位图当中”<sup>[7]</sup>,现在看来这四方十二位对应的佐臣应该就是本篇的“四荒、四宄、四柱、四唯”。

简文接下来对黄帝事迹的描述,基本上围绕着古书中屡见不鲜的“黄帝战蚩尤”故事展开,而且其中许多细节可与已知的其他文献相对读。如简文载蚩尤作五兵,将以征黄帝,见于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劳卦卦辞“昔者蚩尤卜铸五兵”<sup>[8]</sup>,以及《世本·作篇》“蚩尤以金作兵器”<sup>[9]</sup>。简文又说在蚩尤作乱之后,出现了反常的气象:

逆气乃章(彰),云霓从戕(将),(简100)□色长亢,五色焚(纷纷),海柔(雾)大盲。(简101)

蚩尤在风雨云雾的掩护下与黄帝作战,见于《古今注》:“蚩尤作大雾,兵士皆迷”<sup>[10]</sup>,以及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:“有人衣青衣,名曰黄帝女魃。蚩尤作兵伐黄帝,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应龙蓄水,蚩尤请风伯雨师,纵大风雨。黄帝乃下天女曰魃,雨止。遂杀蚩尤。魃不得复上,所居不雨,叔均言之帝,后置之赤水之北。”<sup>[11]</sup>在记载“黄帝战蚩尤”的诸多文献中,对双方作战过程描写最详细的便是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。与之相较,《五纪》篇多了对话、号令以及细节描写,内容更为生动丰富。而简文中参与抵御蚩尤的,除了“女魃”(简文称“鬼魃”)外,还有天神“高畏”以及四荒等黄帝辅臣,并且有明细分工。

以上是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的部分。而对现有认识突破最大的,是简文中关于蚩尤身份的记载:

黄帝又(有)子曰寺(蚩尤,蚩尤)

既长成(简98)人,乃作为五兵。(简99)

此前关于蚩尤的出身,有炎帝之子(《路史》)、赤帝之臣(《逸周书·尝麦》)、黄帝之臣(《管子》《越绝书》)或神农之臣(《世本》宋衷注)等多种说法<sup>[12]</sup>。简文说蚩尤是黄帝之子,这是我们前所未见并且始料未及的。然而细绎史料,仍可找到这种说法的一些端倪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载田千秋对汉武帝上书:“子弄父兵,罪当笞。父子之怒,自古有之。蚩尤畔父,黄帝涉江。”<sup>[13]</sup>所谓“蚩尤畔父,黄帝涉江”,此前均不能确解。王子今曾判断:“或许说明了当时蚩尤传说尚有今人已经不能确知的其他情节”<sup>[14]</sup>,实为卓见。由此看来,《五纪》中蚩尤为黄帝之子,以及成人后作兵叛父的相关传说,到了汉代犹有流传。

虽然《五纪》中的黄帝与蚩尤乃是父子至亲,但面对蚩尤的大逆不道行为,黄帝仍以极刑处之。简文云(封二:7~9):

黄帝既杀寺(蚩)虺(尤),乃向(飡)寺(蚩)虺(尤)之躬(身),焉始为(简109)五芒(芒)。以其发为韭,以其穉(眉)须(须)为菘(蒿),以其目为彘(菊),以其鼻为葱,以其口为鬻(藟),以其亦(腋)毛为首(茨),以其从(简110)为菘(芹)。以其骸为干侯股(股),以其辟(臂)为槩(桴),以其肛(胸)为鼓,以其耳为邵(照)苳(箛)。(简111)

黄帝杀蚩尤后,随即将其肢解,以其器官化为“五芒”。芒,《说文》云“草端也”,蚩尤的须发、眉目、口鼻所化的韭、蒿、菊、葱等,基本上都是植物。而诸如骸、臂、胸这些肢体,则被制成了实用器具。蚩尤死后身首异处的说法,见于魏晋文献《皇览》。在马王堆《十六经·正乱》中也有类似记载<sup>[15]</sup>,但除了“剥其□革以为干侯”外,就没有可与本篇对应之处了。

由于在战国秦汉间流行的黄帝故事中,黄帝、蚩尤都颇为善战,因而后世很多兵书都托名于二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兵书略中,归入“兵形势”的有《蚩尤》二篇,“兵阴阳”有《黄帝》十六篇,此外“兵技巧”的《蹴鞠》二十五篇也是托名黄帝<sup>[16]</sup>。《五纪》篇的黄帝故事中出现了很

多与兵器、军制、阵法以及军事训练、军事礼仪有关的内容，或许可以视作此类兵书的滥觞。如简文记载蚩尤所用之阵“锥”“方”“圆”等，均见于银雀山汉简《十阵》<sup>[17]</sup>。简文还说后世的侯王如要“亲自率师攻邦围邑”，均须效仿黄帝攻伐蚩尤前所行的祭祀。除此之外，以黄帝与蚩尤的这场大战为基础，后帝还设置了相关的军事口号，以及模仿猛兽行迹的军事舞蹈：

左距右距，左牙右牙，左弗（弼）右（简117）弗（弼），进退以我，左霰（营）毋化（过），右霰（营）毋化（过），走晋佳（唯）加。（简118）

与之相配合的，还有管乐与战歌，简文都有很具体的记载，此不详述。

清华简《五纪》中的黄帝故事，除了具有时代早且明确的价值外，内容的丰富性与系统性也都远胜我们以前所见的相关文献，有助于推进黄帝形象以及古史传说的研究。总体而言，其在文献学以及思想史方面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。

首先，《五纪》的发现证明了汉代广泛流传的黄帝故事多是有较早的材料来源的。众所周知，有关黄帝的故事传说，入汉后经过方士与儒生的改造，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<sup>[18]</sup>。受疑古思潮的影响，对于汉代的黄帝故事，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是抱以深刻怀疑的。如顾颉刚曾评价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方士所述的黄帝故事，称其全是为了逢迎汉武帝而编造的“楼台倒影”，“汉代有一事，古代即多一事”<sup>[19]</sup>。现在看来，战国时期关于黄帝的记载就已然非常丰富多元，且极具神话色彩。对于汉代流行的黄帝故事，大概不宜轻易判定为当时人的向壁虚造，需要充分考虑其承袭自战国的可能。

其次，虽然一些关于黄帝的传说渊源有自，但即便是战国时的黄帝故事，也不能全部看作史实。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指出：“上古之事，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，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，与传说无异；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。”<sup>[20]</sup>司马迁自称在作《五帝本纪》时

就遇到了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”的困境<sup>[21]</sup>，其背后的原因便是黄帝故事生成过程的复杂性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云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<sup>[22]</sup>这种托古以自重、编造故事以言说的习惯，不特汉代有之，战国时就已非常普遍。《五纪》中的黄帝故事，应该就是战国时的思想家为了申论其“五纪”学说，汇集当时有关黄帝的材料剪裁而成的。而其中哪些是神话传说，哪些又有史实素地，则是需要我们仔细辨别的。

最后，《五纪》篇中所体现的多元思想的融会贯通，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对战国时期言说黄帝的学术传统进行重新思考。过去的思想史研究，一般都习惯将“黄”“老”并称。汉代的道家讲方技数术，“黄”“老”确实趋于合流，像马王堆汉墓中的黄帝书就是与道家的《老子》同抄于一卷的。受此影响，我们在古书中看到黄帝就很容易将其与道家联系起来。但是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都展示出战国时期的思想著作，其实有一种融合诸说、百家杂糅的趋势。比如《五纪》既反复称道儒家所重视的礼、义、爱、仁、忠等概念，也从不讳言五行、鬼神和方技数术，而其篇终又以黄帝故事收尾，实在很难将其归入任何一个家派。该篇复杂的思想面貌恰恰说明，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黄帝故事并不是道家或者阴阳家的专利，而应将其视作任何立说者均可利用的“公言”，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“百家言黄帝”。

[1] 田旭东《从〈汉志〉著录及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间的黄帝之学》，《西部考古》第三辑，三秦出版社，2008年。

[2] 如《尚书·洪范》的“洪水肆虐—禹行九畴—彝伦攸叙”，《尚书·吕刑》的“蚩尤作乱—黄帝施用刑法以遏绝苗民”，清华简《成人》的“土多见妖，流而淫行”，成人以法度匡正之等，皆是这种模式，其目的便是余嘉锡所说的“设为故事以证其义”，参见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，第8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[3]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，第24页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。

- [4] (宋)李昉等《太平御览》,第369页下,中华书局,1960年。
- [5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玖),第126页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- [6] 湖南省博物馆等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(肆),第151页,中华书局,2014年。
- [7] 李零《说“黄老”》,《李零自选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8年。
- [8] 王明钦《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》,《新出简帛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2004年。
- [9] (汉)宋衷注,(清)秦嘉谟等辑《世本八种》,第7页,中华书局,2008年。
- [10] (西晋)崔豹《古今注·舆服》,第1页,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影印芝秀堂本。
- [11] (晋)郭璞传,(清)郝懿行笺疏《山海经笺疏》,第5013、5014页,齐鲁书社,2010年。
- [12] 其中尤以“炎帝之子”说最为盛行,有学者指出“黄帝战炎帝”也是据此演绎为“黄帝战蚩尤”的。参见刘全志《先秦话语中黄帝身份的衍生及相关文献形成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11期。
- [13] 《史记·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,第1058页,中华书局,1959年。此条材料蒙博士生张帆提示。
- [14] 王子今《汉代“蚩尤”崇拜》,《南都学坛》2006年第4期。
- [15] 同[6],第159页。
- [16] 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第1758~1761页,中华书局,1962年。
- [17]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》(貳),第188页,文物出版社,2010年。
- [18] 这方面的研究,最新的有郭津嵩《公孙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》,《历史研究》2021年第2期。
- [19] 顾颉刚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卷七,第142页,中华书局,2011年。
- [20] 王国维《古史新证》,第1页,清华大学出版社,1994年。
- [21] 同[3],第46页。
- [22] 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,第1355页,中华书局,1998年。

(责任编辑:吴然)

(上接第90页)

五行”或许体现了当时数术思想的某个种类的特点,这与后来的《春秋繁露》等又有极大的不同,这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。

- [1] 简27、28又载:“后曰:‘天下之神祇,神之受算立者,其数如此。’”亦可佐证《五纪》中所立之神是按数量需求而筛选的。
- [2] (清)孙诒让《周礼正义·天官冢宰·内饔》,第269页,中华书局,2013年。
- [3] (清)王聘珍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第5页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- [4] (汉)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第173页,中华书局,2016年。
- [5] 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《国语集解》,第108页,中华书局,2002年。
- [6] 迟铎《小尔雅集释》,第357页,中华书局,2008年。
- [7] 《十三经注疏(清嘉庆刊本)·礼记正义》,第3616页,中华书局,2009年。
- [8] 《十三经注疏(清嘉庆刊本)·春秋公羊传注疏》,第4915页,中华书局,2009年。
- [9] 同[4],第173页。
- [10] 同[4],第61页。
- [11] 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司马贞《索隐》,第2293页,中华书局,1959年。
- [12] (宋)陈彭年《钜宋广韵》,第144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。
- [13] 简文“十”字原以“惠”为意符,写作“𠄎”,可能是为表示十进制而造的专字。
- [14] 但简文将明显属于天神的“天”归入“示(祇)”,似又对应对不够严整。
- [15] 参见晏昌贵《巫鬼与淫祀——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》,第153~169页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
- [16]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《望山楚简》,第98页,中华书局,1995年。
- [17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肆),第115页,中西书局,2013年。
- [18] 参见[16],第83页。
- [19] 同[7],第2665页。
- [20] 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《包山楚墓》,图版一八八、一八九,文物出版社,1991年。
- [21] 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第145页,文物出版社,1998年。
- [22] 只在简44记有“水火相行”,简70记有“建设五行”语。

(责任编辑:吴然)